

穗港走廊地带的形成和演变梗概

司徒尚纪
(地理学系)

摘 要

穗港走廊地带的形成和演变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积累,它是一个时间推移和空间拓展的统一过程。虽然在历史早期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沿珠江向南扩展的通道,但只到明清时期,才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造就了走廊地带的雏型。由于香港崛起,近代交通发展,市场网络的扩大,以及城镇化的加快,最终形成穗港双中心并峙的地理点轴体系,延伸和加强了走廊地带的内外辐射,是它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近30年,穗港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局面。这种状况只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改变,并在走廊地带出现经济腾飞新局面。

关键词 穗港走廊, 历史积累, 地理点轴, 内外辐射

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东翼,有一条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水陆交通便捷,城镇化过程在迅速推进的狭长地带,被称为穗港走廊。它北起广州,南迄香港,相距160km,东西宽数十公里,中间包括增城、东莞和深圳。目前它正崛起为全国重要经济开放区而举世瞩目。但这条走廊的形成和发展,除得利于位置的优越、政策的优惠、信息的灵通以及其它机遇以外,还有历史的积累。这个因素至今仍是区域发展的背景之一,并影响到这一地带的性质、结构和功能。故研究它形成的历史过程、特点和机制,不但有助于认识自身演变规律,而且对于制定三角洲未来发展规划,也有重要意义。

1 鸦片战争以前历史积累所奠定的经济基础

早在三、四千年前,人们已在这一带劳动繁衍。秦汉时,番禺(广州)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重要枢纽,东莞、宝安均属今广东地区建立最早的南海郡博罗(今博罗)县地。到唐代增城、莞城、南头作为当地经济中心已具一定规模,而广州作为世界性贸易大港,光聚居城内阿拉伯商人就有12万,经济有较大发展。宋元时,三角洲进入开发高潮,广州成为一大米市,与广州贸易国家多达50多个,元代发展到147个。东莞还是全国有数的几个著名产糖区之一,增城荔枝远近闻名,各地村镇也大量出现。宋代广州附近有瑞石、并石、猎德、大水、石门、白田、扶胥7镇,增城有足子镇,东莞有不少盐场和银

本文1989年6月5日收到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场。元代这些古地名更多，如馆驿在增城有3处，东莞2处；递铺在番禺有10处，东莞3处，增城10处，多有名称可考¹⁾。此外还有一些河渡。明清时期，随着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商路被进一步加强，一条以珠江河道为轴线，聚集着众多城镇和圩市的经济走廊已奠定了基础。据统计，番禺、东莞、增城、新安4县人口，从康熙初到嘉庆末约一个半世纪增长了12倍，而耕地只扩大9%²⁾。人口给土地的巨大压力和这时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促进了专业化农业区的发展，结果形成了广州附近、东莞石龙、麻涌、蕉利，增城新塘、新安南头的水果业；番禺、东莞、增城甘蔗，以及东莞、新安大面积水草产区。

农业商品化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形成各级手工业中心。除广州、佛山是全省最大手工业城市外，一般县城和某些圩镇，手工业也具一定规模。如东莞陶器、鱼冻布、芙蓉布、莞席、蜜香纸、海盐；增城果品加工；新安缙布等都享有一定声誉。产蔗最多的番禺、增城、东莞，榨季一到，“遍诸村岗垄，皆闻戛糖之声”³⁾。石龙、市桥、新塘等都是较次一级手工业中心。商品农业发展，同时切断了原料产地与加工场所、传统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自然联系，造成它们的地域分离，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活动条件。广州除与省内各地商业往来以外，还有闽、浙、苏、皖、鲁、晋、冀、陕、甘、川、滇、黔、桂、湘、鄂、豫、赣诸省运来的土产同洋货。有人估计，1700~1830年广州港白银输入量在9千万到1亿英镑之间，约合4亿元，平均每年约300万元⁴⁾。其它各县城在明代都得到修建，有利于它们作为地方经济中心的形成。另外，一些名镇也在这时兴起，如“石龙一镇，为邑之北户”，并因其“交通广、惠，商贾如云。而渔盐之利、蕉、荔、桔、柚之饶，亦为东南诸邑之冠”⁵⁾，成为明清广东4大名镇之一。与此同时，圩市更有较大发展。据嘉靖《广东通志》统计，明中叶三角洲有圩市106处，分布在这一地带的有40处，占37.7%。每个圩市平均服务人口和腹地半径也略大于三角洲其它地区。雍正、乾隆时，在商品经济进一步高涨基础上，圩市又呈猛烈增长之势，总数比前期增加了3.7倍，其中番禺为3.8倍，东莞为3倍，增城为1.3倍。嘉庆、道光年间，圩市总数再度上升了32%，增城、东莞有1~2倍增长额⁶⁾。例如新安县嘉庆时新开辟的就有沙井、升平、清平、白龙岗、新圩、桥头、福永、王母、长洲、碧洲、大鹏、乌石岩等圩市。但圩市分布仍以广佛附近最为密集，逐渐向南减少，其对外辐射也呈同样衰减趋势。

走廊地带上的地理点轴主要受传统商路支配。据驿站分布寻其路线，大致是溯东江并汇合增江构成一条水陆交通线，沿途经新塘、石龙、仙村、石滩、增城、正果等圩镇、再转粤东、闽南各地。另一航线经珠江口伶仃洋到沿海乃至东西两洋。特别是这条

1) 元·陈大震《南海志》卷10

2) 光绪《广州府志》卷70

3) 原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五)，第38页引康熙《广州府志》

4)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二册，第501~504页

5) 乾隆《广州府志》东莞图记

6) 统计数字参见嘉靖《广东通志》、雍正《广东通志》、乾隆《番禺县志》、雍正《东莞县志》、嘉庆《东莞县志》、《增城县志》、《新安县志》、宣统《东莞县志》

航线经过的香港,明清时已是广州外港,“则凡东越惠潮,北往闽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该处经过”⁷⁾,香港担竿洲“番舶入广,必由此”⁸⁾,急水门外,大奚山南的长洲,“商贾多聚集于此”⁸⁾。不过这时是以新安南头为航运中心的,因为“澳门至省则水浅不能行,必须由大屿山经南头直入虎头门,以抵于珠江,此南头所以为全广门户也”⁸⁾。此外,这条航线上还有佛山抵南头、西乡抵石龙、黄松岗抵石龙的长水渡船。

2 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经济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与走廊地带的形成

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三角洲经济沦为半殖民地化,并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一方面加强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使它在走廊地带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种变化而建立的市场网络及运输多样化,使各点轴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有力,最终导致走廊地带的形成,并向周围地区表现了较强烈的辐射作用,成为这个时期制约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因素。

战后东莞、增城、新安等地稻田大面积减少,当地30%以上人口依靠洋米过活;甘蔗种植和制糖业也因香港建立大型糖厂,大量机制糖输入而备受打击,棉花和棉纺织品在这一带本有一定产量,后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而受严重破坏。在旧的经济结构瓦解同时,由于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商品经济的刺激,本地带生产商业化更加深刻和广泛,并形成新的分布格局。1933~1936年,番禺、东莞、增城、宝安4县果业分别占三角洲水果面积69%和产量88%⁹⁾,成为高度集中化水果种植带。东莞、宝安草织业畸型发展,城郊蔬菜业也扩大种植面积,广州市郊、新塘、石龙、南头、深圳等地还建立起出口基地,供应香港、澳门。但这些生产深受世界市场各种风潮影响,深刻地打上半殖民地时代的烙印。经济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造成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城镇,加速本地带城镇化进程。1901年广州人口为85万,1921年为90万,1936年达130万。香港人口增长更快,从开埠之初几千人增加到1907年40万,1921年62万,1929年80万,1937年突破100万大关。城镇和圩市人口也相应增长,以1934年广东人口密度分级为例,在人口稠密的13个县市中,本地带已占4县市^[1],在全省人口分布图上非常突出,也是它在全省地位的反映。

广州、香港经济在战后的发展是走廊地带形成的关键,也是它内外辐射的基础。

马克思曾经指出,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产生一个结果,即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广州腹地被分割,在全国地位被动摇和削弱。但另一方面,广州又在它原来基础上发展起来,演变为综合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特别是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瓦解,广州通过香港进入世界市场,走上同世界经济交往道路;为配合商品经济及其运动,广州逐渐建立起包括铁路、公路、内河、海运乃至航空在内的通往国内外的交通运输网络,成为华南交通运输枢纽。这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小商品生产条件下广州的历史

7) 《夷务始末》卷90

8) 嘉庆《新安县志》卷12

9) 原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六),第11页

地位和作用，加速它经济中心的现代化过程，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内外辐射。例如从主要以广佛商人组成的“粤商”在全国重要省市设立的会馆分布之广，直接反映广州已构筑起向全国内地多向辐射态势。香港主要是以国际贸易为其经济支柱，同时也依靠走私鸦片，贩卖人口等发达起来。1861年英国并吞了九龙半岛，1898年又拓展新界，香港行政区面积扩大了10倍。1845~1849年广州港从香港进口货值平均每年以60.9%速度增长；70~80年代约1/5中国出口货和1/3进口货是经香港中转的^[2]。本世纪30年代，内地输港商品占香港总输入1/3，抗战后到1951年则为24%。与此同期，香港输往内地商品分别占总输出40%和30%^[10]，其中香港对华南贸易额约占其对中国内地贸易额的一半^[3]。以香港为枢纽的外洋和内河航线抵达世界各大港口和省内各地。可见香港作为一个转运港，集散东西方货物一直是它对外辐射的主要功能和基本活动，这种情况继续到解放前夕。

在穗港发展同时，其中间地带人口也向较大圩镇集中。如东莞、增城每个圩镇平均服务人口达1~2万，比战前有成倍、甚至十多倍增长。沿河一些大圩镇的功能进一步多样化。例如石龙，清政府在这里先后设置军事、政治、经济等官衙。同治五年（1866年），全省设广州、佛山、新塘、藁兰、石龙5厂、征收厘金。它们主要分布在这条走廊上。光绪34年（1908年）和宣统元年（1909年）各厂厘金收入比较，新塘超过广州，而石龙与广州差不多^[11]。民初新塘从商人数达7~8千人，店铺上百家，商务非常繁盛。东莞太平明末清初已达万人，为珠江口巨镇。它们都是穗港对外辐射的接力点。

古代三角洲运输主要依靠舟楫，到了近、现代水运地位仍很重要。1932年由九龙往来的外轮数居全国各航区之首，压倒上海，而广州居全国第三位^[12]。同年广州港拥有码头数量亦为全国各航区第一^[12]。在水网稠密地区，航线还有较多增长。番禺同治时（1862~1874年）长水渡为188条^[13]，宣统时（1909~1911年）增加到253条^[14]；东莞嘉庆时（1796~1820年）为57条^[15]，宣统时已达172条^[16]，包括县内外以及境内各乡镇间往来。只在丘陵面积较大地区，水渡线越来越疏，如增城嘉庆时有50条^[17]，到宣统时仅剩28条^[18]，宝安也有类似情况，这与当地陆路交通发展不无关系。光绪32年（1907年）开始修筑广九铁路，宣统三年（1911年）竣工通车。自此水陆运输竞争十分激烈，结果铁路承担了大部分客运和货运。但广九铁路建成之初，因未能与粤汉铁路接轨而使运输量受到极大限制，直到抗战开始才加入全国铁路网，业务日有长进，成为走廊地带运输干线和地理主轴。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这里相继修建了公路。到1949年东莞建成公路14条，总长197.6km；增城10条，总长170.5km；宝安8条，总长124km。这些公路与铁路、水运

10) 广州市社科院编《广州经济中心文集》上册，第68页，1984

11) 民国《广东通志初稿》卷6

12) 《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第1105~1106页，民国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3) 同治《番禺县志》卷18

14) 宣统《番禺县志》卷6

15) 嘉庆《东莞县志》卷17

16) 宣统《东莞县志》卷20

17) 嘉庆《增城县志》卷4

18) 宣统《增城县志》卷10

相配合,大大加强了走廊地带的对外辐射。

根据其功能和对外辐射强弱,这些城镇可划分成4个等级,构成走廊地带的城镇体系。第一级是广州和香港,作为大区域经济中心,辐射远及内地主要城市及亚、欧、澳、北美等重要海港;第二级为县城或小流域中心地,如莞城、增城、南头,以及石龙、新塘、太平、樟木头等水陆运输口岸,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第三级为城乡物资交流中心,影响限于附近,对外有一定联系,其数量较大,如东莞中堂、寮步,增城正果、仙村,宝安福永、大埔、王母等;第四级为乡间小圩,分布广、数量大,是城镇体系最低层次。联结城镇体系的水陆交通轴线也有相应等级体系,主轴为广九铁路、广汕公路、珠江、东江航线,它们联结穗港或沿线大小城镇;次轴为县级公路和增江航线,联结二级经济中心,如广州—莞城—南头,增城—紫金,莞城—石龙,宝安—太平公路等;再次轴为联结三级城镇的公路分支侧线及小支流,如增城—仙村,观澜—天堂围,莞城—厚街—太平、深圳—罗湖等;最后为小圩之间大路,是民间运输主要通道。这两个体系的点轴相互匹配,形成城镇圈层大小相套,交通网络主次衔接的连续而有序的空间结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加强其空间联系和内外辐射,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3 解放后到1978年穗港两头发展和中间地带萎缩

广州经济地位在解放后虽然没有动摇,但已由过去商业和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这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商业、外贸和饮食服务业被抑制和缩减。这种转变虽有助于加强广州经济中心的辐射能力,但未能发挥它历史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商业和外贸这两个最大特点与优势。另外,广州人口也大起大落,从1950年105万增加到1960年197万,年递增率为7%。但在经济困难和十年动乱时期,广州大批人口流向农村,到1977年只有163万。人口长期徘徊,从侧面反映广州的凝聚力和辐射作用被削弱了。此期间广州对外辐射主要通过广九铁路和珠江转口香港对外贸易,中间缺乏中继站,结果在边境形成一条“绝缘带”。深圳就是这条地带上小镇,发挥微弱的客货过境功能。香港经济却在此时获得高度发展,短短30年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性城市,贸易、航运、金融、旅游中心,以及工商业中心和世界大港,为香港发展史上黄金时代。其人口也迅速膨胀,大约每10年增加100万,例如1951年为200万,1961年为313万,1976年达440万^[4]。香港影响所及非只中国内地,而扩展到亚洲乃至全世界。但在对内关系方面,由于两地制度差异,经济交流也受的阻塞,香港通过这条走廊对内辐射被限制在最低点。

在穗港各自发展同时,其中间地带的经济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这几乎被增长近一倍的人口压力所抵销,这又明显地反映在它的城镇化过程上。可以说只在1957年以前,小城镇还比较健康地发展,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商品生产萎缩,小城镇数量锐减,人为地不设镇,甚至撤镇。如1957年本地带共有10个建置镇,约占三角洲建置镇的1/3,但直到1980年这个数量和比例仍无变化。而且这些小城镇多数是各级行政中心,商业服务设施不发达,即使有少量工业也主要是粮油加工业和支农工业,未能形成为经济中心。另外,它们主要面向本身腹地,追求小而全的发展方向,不但经济结构大致相同,

同级城镇经济联系很少，而且以行政而不是以经济手段加以管理，形成各自为政、条块分割局面；更没有多少投资，彼此之间缺乏分工协作，故自身发展陷于困境，也谈不上有多少对外辐射能力。结果造成走廊地带两头强大、中间微弱的畸型发展局面，这种不正常状况只在近十年才有所改变。

4 结 语

穗港走廊地带是珠江三角洲地理、历史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在历史早期它是广州作为起点和基础，利用珠江水道，联结沿河城镇，作为内外交通门户和辐射扩散通道的，这也是它地理点轴形成之始。但只到明清时期，由于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才在传统商路基础上造就了走廊地带的雏型。然而它的最终形成，则是在香港作为一个巨大经济中心的崛起之后，使走廊地带首尾对应，相互促进。各地理点轴不但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层次和结构，而且在功能上也各有区别，形成以广九铁路和珠江水道为主轴、包括公路和城镇体系在内的经济地理网络，延伸和加强了走廊地带的内外辐射，这是走廊地带演变的转折时期。

近30年来，广州在自己经济原型基础上加强了作为生产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和对外辐射，却削弱了商业贸易的特点和优势，而香港则迅速发展为现代化多功能综合性经济中心，穗港之间产生强烈对比。与此同时，走廊地带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过程被阻滞、辐射功能萎缩，造成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深圳特区的崛起而渐有改变，出现了走廊地带和三角洲其它地区经济腾飞的新局面。

参 考 文 献

- [1] 朱云成等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68
- [2] 黄 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4
- [3] 关其学、刘光璞，论经济中心—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1987，71
- [4] 郑德良，现代香港经济，中国财经出版社，1982，7

The Outline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Guangzhou--Hong Kong Corridor Zone

*Situ Shangji**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Guangzhou-Hong Kong corridor zone is a long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an unitive process of time's movement and spatial expansion. Though early in history, there formed the accesses which took Guangzhou as center and extended further south, until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rridor zone origin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fter the opium war, with the soaring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ransportation, the expansion of market network and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geographical Point-Axle model was formed ultimately, in which, Guangzhou--Hong Kong stalemated as the two centers, It extended and strengthened the radiation of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corridor zone. It is an important transformed perio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rridor zone.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this different way of development between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caused the unbalance of development between these two regions. Onl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en door and economic reform policies, the unbalanced situation began to change and a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appears in the Guangzhou-Hong Kong corridor zone.

Keywords Guangzhou--Hong Kong corridor zon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geographical point-axle, inside and outside radiatio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